DOI: 10.6277/TER.202503_53(1).0002

分紅制度、企業社會責任和租稅治理制度是否能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和減少逃稅

孫鈺峯・陳詩穎*

本文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紅制度、稽核審查、追討短報公司收益和處罰機制放入當事人 — 代理人模型中, 探討分紅制度、企業社會責任和租稅治理是否能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和減少逃稅, 獲得結論爲: (1) 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增加能使經理人提高工作努力程度, 也能抑制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行爲。(2) 租稅治理制度會使股東選擇較低的分紅比例, 若處罰逃稅行爲的罰款低, 無法抑制逃稅行爲; 若罰款高就能抑制逃稅行爲, 但要以經理人減少工作努力、企業社會支出減少、經理人和股東效用減少作爲代價。

關鍵詞: 分紅, 逃漏稅, 企業社會責任
JEL **分類代號**: D86, H21, G34

1 前言

氣候變遷日益嚴重, 因爲極端氣候導致的災害頻傳, 企業開始注意在獲利的同時是否兼顧企業社會責任, 希望透過企業社會責任能達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其中有三個議題, 環境保護、社會包容和經濟發展被視爲達成目標關鍵動力。貫穿這三個議題, 首推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 CSR), 其涵義是要求企業除了追求利益之外, 還需要對社會、

*作者分別爲逢甲大學財稅學系副教授與嶺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碩士。孫鈺峯爲通訊作者 (yfsun01@gmail.com)。本文初稿在台灣經濟學會 2023 年年會發表時, 承蒙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吳世英教授惠予精闢評論, 且與會學者提供寶貴建議; 在投稿時, 又蒙特刊編輯委員和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諸多指正, 並提供珍貴的建議, 讓本文更加完備, 僅誌最高謝忱。當然, 本文若有任何缺失, 悉由作者負責。

經濟論文叢刊 (*Taiwan Economic Review*), 53:1 (2025), 35–70。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衛生安全、環境保護、員工、利害關係人負責。該議題現今已成爲國際重視議題, 企業在國際商業競爭必備條件。

傳統經濟理論認爲, 只有當 CSR 符合利潤和股東財富最大化的主要目標時, 公司才能將資源投入 CSR 活動 (Friedman, 2007)。這個保守的觀點, 隨著世界潮流變化, 演變成將 CSR 擴大關注在爲自己和相關的社群的財富做出貢獻, 因此在執行企業社會責任時, 需要平衡不同利害關係人群體的需要, 達成企業對於員工、利害關係人互惠。Stephenson (2009) 主張 CSR 實踐可以透過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並改善與他們的關係來提升企業聲譽。Godfrey, Merrill, and Hansen (2009) 提到企業進行 CSR 活動, 能提升聲譽, 用來對抗風險。Saeidi et al. (2015) 發現 CSR 與企業績效之間的聯繫是透過 CSR 對競爭優勢和聲譽的影響, 此可解釋 CSR 能維持良好的聲譽, 進而增進財務績效的基礎, 例如: 聲譽可以增加銷售量、顧客滿意度、員工滿意度和優於競爭對手的競爭地位等。Cabral (2012) 認爲企業想用聲譽影響財務績效, 需透過企業的策略, 例如 CSR, 才能獲得成果。類似的研究結果, Neville, Bell, and Mengüç (2005) 認爲企業社會責任措施會影響公司聲譽, 進而影響財務績效。大量研究證據也支持 CSR 實踐對企業聲譽有正面的影響 (Chapagain, 2022; Cherian et al., 2019; Esen, 2013; Stanaland, Lwin, and Murphy, 2011; Story, Castanheira, and Hartig, 2016; Taghian, D'Souza, and Polonsky, 2015); 據此, 實證發現善盡 CSR 的企業有較好的營運績效和公司價值是可被預期 (Chapagain, 2022; Deng, Kang, and Low, 2013; Edmans, 2011; Elliott et al., 2014; Matsumura, Prakash, and Vera-Muñoz, 2014; Mishra and Suar, 2010; Wei et al., 2020; 池祥萱, 繆文娟, 與莊澄臻, 2014; Yusoff and Adamu, 2016)。

要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就必須落實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就是落實於董事會獨立性、財務資訊透明化、消除舞弊行爲, 藉此建立有效監督公司管理制度, 防止經理人藉由資訊優勢做出危害股東權益。通常善盡 CSR 的企業, 其財務資訊的揭露較爲透明, 不會做盈餘管理, 較爲投資人所信賴 (Kim, Park, and Wier, 2012)。經濟學家認爲經理人會有侵害股東利益行爲是源自於兩者的利益不一致且相互衝突, 若能建立調和兩者利益趨於一致的制度就能解決問題, 例如: 股東給予經理人激勵誘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像是利潤分紅、獎勵經理人多持有公司股份, 就能誘導經理人利益與股東利益趨於一致, 使經理人不會做出危害股東利益的行爲。

不少實證文獻將避稅問題放到 CSR 架構下進行討論。學者們認爲 CSR 企業在道德的規範下會遵守稅務規範。Li et al. (2022) 以巴基斯坦的中小企業的員工做爲研究的對象, 研究員工行爲、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和避稅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其研究結果推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將減少避稅行爲, 證實了 CSR 企業會遵守稅法的假說。

將避稅問題延伸至逃稅問題, Montenegro (2021) 以 25 個 OECD 國家爲樣本, 檢視企業社會責任、國家治理和逃稅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 國家治理品質與逃稅呈現顯著負相關, 也發現國家治理對企業社會責任與逃稅之間關聯的中介作用有顯著支持; 在國家治理薄弱的國家, 企業社會責任和國家治理是具有替代性; 在國家治理強而有力的國家,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特別是環境資訊揭露) 似乎被用作企業的裝飾和補償工具, 以減輕因逃稅活動而產生的聲譽風險。

在經典的逃稅文獻是從理性的逃稅者, 由逃稅行爲獲得金錢邊際利益和邊際成本孰大來決定是否逃稅。例如: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Wang and Conant (1988)、Yaniv (1995)。較新發展是關注逃稅產生的聲譽風險, Ratto, Thomas, and Ulph (2013) 認爲被調查的聲譽損失是社會互動影響個人納稅決策一個重要因素。該文說明逃稅行爲產生的聲譽成本, 可能成爲決定逃稅的關鍵因素。相同的論述, Di Gioacchino and Fichera (2022) 認爲影響逃稅的因素, 除了獲得正面的金錢效用外, 另外就是逃稅產生負面的聲譽成本。當金錢效用大於聲譽成本, 企業就會選擇逃稅。爲了證明聲譽在逃稅行爲的影響效果, 有些文獻分析「點名羞辱 (naming-and-shaming)」政策的有效性, 該政策是使用揭示已繳納的稅款和逃稅者的身份。Dwenger and Treber (2018) 發現, 斯洛維尼亞 2012 年推出的針對逃稅者的羞辱政策使其稅收債務減少 8.5%, 尤其是在聲譽問題很重要的行業非常有效。Bø, Slemrod, and Thoresen (2015) 使用挪威資料分析類似政策的影響, 發現企業申報的收入平均增長了 3%。Slemrod, Rehman, and Waseem (2019) 使用巴基斯坦的數據分析類似的政策效果, 發現申報收入增加 2–9 個對數點 (log points)。這些證明逃稅行爲產生的聲譽成本是納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重要的考量。

上述文獻適合解釋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同爲一人的情況, 或是家族企業的逃稅或避稅的行爲。台灣過往的研究, 台灣有 65.6%由家族控制。這些企業由家族成員擔任公司重要的管理階層, 使得所有權和管理權重疊; 他們有可能基於自利而努力追求公司價值, 也有可能因爲圖利自己而做出侵害其他小股東行爲, 避稅是其中之一。林嬌能與許彩蓮 (2011) 依據此觀點進行研究, 發現家族企業會因私利而進行更多的租稅規劃; 若有引入有利營運的公司治理, 例如: 較高法人持股比率、較大董事會規模, 會降低家族企業的租稅規劃, 防止避稅風險, 顯示家族企業也是需要公司治理的監督機制, 方可抑制避稅風險的發生。

有些文獻認爲: 公司所有權人和經理人分別不屬同一人時, 就會產生逃稅行爲, 這是因爲董事會和經理人利益不一致所導致。Chen and Chu (2005)、Crocker and Slemrod (2005) 以股東 — 經理人的架構探討公司逃稅問題。Chen and Chu (2005) 將逃稅的決策設定在股東, 而經理人負責向稅捐機關申報公司收益。他們勾結逃稅有可能是經理人承擔逃稅責任, 因此經理人會要求透過薪資契約獲得補償。據此, 薪資契約就失去控制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功能, 造成效率損失。Crocker and Slemrod (2005) 則是將逃稅行爲歸咎於經理人, 因爲股東會按照有效稅率的高低決定經理人的薪資, 導致經理人高報所得扣除額而有逃稅的行爲。此外,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以及 Desai, Dyck, and Zingales (2007) 指出, 經理人經常使用複雜的交易用來避稅, 此舉除了向稅捐機關隱藏資源外, 還可以向股東隱藏盜用公司資源, 獲得利益。複雜的避稅策略也會加劇經理人與股東之間的資訊不對稱, 增加股東的監督成本。

張瀞云 (2011) 除了結合 Chen and Chu (2005) 和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的觀點外, 並將分紅制度加入模型, 用來調和股東和經理人利益衝突的激勵誘因機制。模型設定經理人掌控自身的努力程度, 而股東無法獲知經理人努力程度, 但是股東可以利用分紅制度激勵經理人的努力投入, 而增加公司利潤。另外, 該文設定經理人擁有公司盈利的私人信息, 可以向股東和稅捐機關少報公司收益, 並將未申報的收益佔爲己有, 因此產生逃漏稅的情況。其結果顯示: 利潤稅率提高、稅捐機關查核率和逃稅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罰率提高會使經理人更努力投入工作, 以及減少短報公司獲利金額。

上述文獻不同於以往逃稅經典文獻, 更切合現代公司架構所產生的問題, 但是無法呈現像 Montenegro (2021) 獲得 CSR 和逃稅的關係。陳琳方, 翁堃嵐, 與郭虹瑩 (2020) 將 CSR 納入逃稅模型中, 關注利潤稅是否依然具有中立性的性質。他們假定廠商的租稅逃漏稅訊息被揭露時, 會降低 CSR 投入的成效, 利潤稅的中立性將不會成立。然而, 該文所關注的是利潤稅是否中立性, 所以沒有推論 CSR 和避稅的程度之間的關係。吳朝欽與顏志達 (2011) 補充這項不足之處。該文將廠商的環保社會責任納入逃稅模型中, 重新探討廠商生產與逃漏稅決策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可分離性。結果發現: 當政府提高稽查率或懲罰率, 不一定能夠嚇阻廠商的逃漏稅行爲, 而且當廠商的社會責任動機提高時, 會減少產出水準與逃稅數額。

我們認爲現有的文獻有幾點不足的地方需要補充。第一、張瀞云 (2011) 發現分紅比例可以發揮誘因作用, 使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 且較爲願意誠實申報公司收益, 那麼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對廠商產生的聲譽效果, 有利公司收益, 這個效果是否能引發經理人更努力工作呢? 假如可以像分紅制度那樣作爲激勵員工績效的工具, 是否能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行爲? 第二、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會造成公司逃漏稅, 使公司聲譽受損而影響營利。假如分紅制度和企業社會責任機制無法杜絕經理人不當行爲, 就必須建立租稅治理機制, 公司應主動建立稽核審查、追討短報公司收益和處罰機制, 積極規避逃稅被罰風險。這項機制是否會影響分紅制度的誘因效果呢? 第三、假如租稅治理會影響股東分紅比例的選擇, 那麼會影響經理人的短報公司收益行爲嗎? 第四、加入租稅治理對經理人和股東利益會有何的影響? 爲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本文需要將企業社會責任聲譽效果、逃漏稅的聲譽減損效果、分紅制度、稽核審查、追討短報公司收益和處罰機制放入當事人 — 代理人模型中, 探討分紅制度、企業社會責任和租稅治理是否能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和減少逃稅, 維護股東利益。

本文的貢獻在於發現下列結果: 第一、公司投入企業社會資源, 提高公司聲譽, 除了能激勵員工努力工作, 還能抑制員工短報公司收益的行爲, 防止其所衍伸的逃漏稅問題。第二、引入租稅治理監督機制, 公司會因監督機制而選擇較小的分紅比例, 若處罰不夠嚴厲, 會因誘因機制不足, 加劇員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隱匿公司收益金額, 而且員工會降低工作努力程度, 公司會選擇較多的企業社會責任支出, 補救發生逃稅對聲譽的傷害; 第三、企業改採嚴格租稅治理, 會抑制逃稅行爲, 但是公司會選擇更少的誘因機制, 降低企業社會責任支出, 員工會選擇減少工作努力程度, 而公司和員工的效用會下降。

本文共分4節, 除了第1節的前言外, 第2節爲理論模型, 根據文獻建立基本模型; 第3節爲數值模擬分析, 將本文模型中的參數設定適當的數值, 進行數值模擬分析; 第4節爲結論與建議, 將模型推演與數值模擬分析結果, 給予結論和建議。

2 理論模型

2.1 基本模型

依據 Solow (1979) 效率工資模型的設定, 公司的老闆用經理人從事生產, 經理人提供固定工時, 投入生產產量由工時和努力程度決定。生產函數設定爲

$$y = f(eL), \quad f'(\cdot) > 0, \quad f''(\cdot) < 0。 \tag{1a}$$

式中, y 爲產量, L 爲工時, e 爲努力程度。$f'(\cdot) > 0$, 表示經理人工作投入增加會增加產量; $f''(\cdot) < 0$ 表示工作投入具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依據 Guerrazzi (2020)、Guerrazzi and Sodini (2018) 的設定, 本文將生產函數設定成顯函數形式

$$y = A(eL)^{\alpha}, \quad A > 0, \quad \alpha \in (0, 1)。 \tag{1b}$$

式中, A 爲生產技術參數, α 爲勞動的產出份額。本文關注經理人努力程度的影響力, 因此將固定投入的工時令其爲1, 即 $L = 1$, 生產函數變成

$$y = Ae^{\alpha}。 \tag{1c}$$

Neville, Bell, and Mengüç (2005)、Cabral (2012)、Saeidi et al. (2015) 提到企業進行 CSR 活動, 可透過聲譽提升, 增進財務績效。從此觀點切入, 聲譽的提升有利商品的銷售, 提高顧客忠誠度。假定公司股東關注企業社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責任, 公司投入 m 單位支出執行 CSR, 此舉會產生聲譽效果, 有利商品銷售而增加收益。根據陳琳方, 翁堃嵐, 與郭虹瑩 (2020) 的設定, 收益函數可設定爲

$$\theta(m)R(y), \quad \theta(m) \geq 1, \quad \theta'(m) > 0, \quad \theta''(m) < 0。 \tag{2a}$$

$R(y)$ 是傳統收益函數, $\theta(m)$ 是聲譽效果函數, 其最小值等於 1, 其表示聲譽無助於收益, 大於 1 則有助於收益。$\theta'(m) > 0$ 表示投入 CSR 有助於聲譽, $\theta''(m) < 0$ 表示 CSR 的投入具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爲了方便求解, 本文將式 (2a) 中的 $\theta(m)$ 設定成顯函數形式爲

$$\theta(m) = 1 + z \cdot m^{\beta}, \quad \beta \in (0, 1), \quad z > 0, \tag{2b}$$

式中, z 爲聲譽傳播的技術參數, β 爲 CSR 投入對聲譽的份額。

鑒於自 1980 年代起, 許多公司爲了激勵員工投入工作, 會在薪資中設計分紅制度。此項制度常被經濟學教科書引入, 文獻將其視爲效率工資另一種形式 (Liu, 2012), 作爲解決老闆和員工因資訊不對稱, 所誘發的道德風險。依據張瀞云 (2011) 的設計, 將分紅制度放入工資的設計中, 公司採用分紅制度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 據此工資的給定是以一部分的收益分紅給經理人, 工資的訂定爲

$$w = s\theta(m)f(e) \tag{3}$$

稅後利潤

$$(1 - \tau)[(1 - s)\theta(m)f(e) - m], \tag{4}$$

依據張瀞云 (2011) 的設定, 股東爲風險中立的決策者, 其目標就是追求最大的稅後利潤, 他的決策問題就是選擇 s、m 獲得效用極大:

$$\max_{s,m} U^s = (1 - \tau)[(1 - s)\theta(m)f(e) - m], \tag{5a}$$

將式 (1c) 和 式 (2b) 代入, 式 (5a) 變成

$$\max_{s,m} U^s = (1 - \tau)\left[(1 - s)\left(1 + zm^{\beta}\right)Ae^{\alpha} - m\right]。 \tag{5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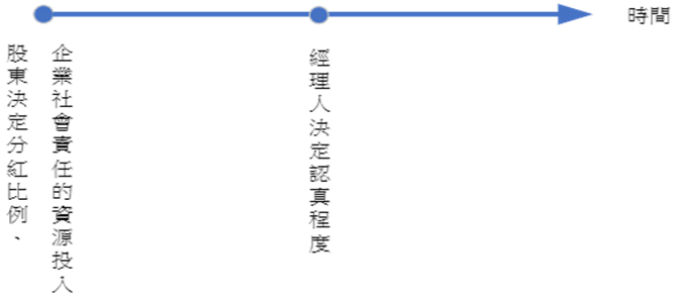


圖 1: 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

雖然文獻都以經理人爲風險趨避者, 但是這個設定不是構成經理人選擇努力程度和逃稅的重要主因。本文依據 Crocker and Slemrod (2005) 和張瀞云 (2011) 的設定, 本文簡化模型, 將經理人設定爲風險中立的決策者, 他的決策問題就是選擇 e 追求效用極大

$$\max_{e} \; U^a = s\theta(m) f(e) - \lambda e, \tag{6a}$$

其中, λ 爲勞動負效用權重, 表示增加一單位勞動努力程度所減少的邊際效用。將式 (1c) 和式 (2b) 代入, 式 (6a) 變成

$$\max_{e} \; U^a = s\left(1 - zm^{\beta}\right) Ae^{\alpha} - \lambda e。 \tag{6b}$$

基本模型要解出能達成股東和經理人決策目標的 s^*、e^*, 他們的決策時間順序顯示在圖 1。圖 1 顯示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 他們決策時間有先後順序, 可視爲一個兩階段的賽局。股東先決定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源投入, 而後經理人根據股東的決定做出反應, 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努力程度。

本文採用由後往前歸納法 (backward induction) 求解, 先由經理人在已知股東決定 s 和 m 之下, 選擇 e, 以達成效用極大化的目標, 一階條件爲

$$\frac{\partial U^a}{\partial e} = s\left(1 + zm^{\beta}\right) \alpha Ae^{\alpha-1} - \lambda = 0, \tag{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理後獲得

$$e = \left(\frac{s\left(1 + zm^{\beta}\right)\alpha A}{\lambda} \right)^{\frac{1}{1-\alpha}} 。 \tag{8a}$$

對式 (8a) 微分可以獲得

$$\frac{\partial e}{\partial s} \equiv e_s = \frac{1}{(1-\alpha)s} \left(\frac{s\left(1 + zm^{\beta}\right)\alpha A}{\lambda} \right)^{\frac{1}{1-\alpha}} = \frac{e}{(1-\alpha)s} > 0, \tag{8b}$$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e}{\partial m} \equiv e_m &= \frac{1}{1-\alpha} \left(\frac{s\left(1 + zm^{\beta}\right)\alpha A}{\lambda} \right)^{\frac{1}{1-\alpha}} \frac{\beta z m^{\beta-1}}{1 + zm^{\beta}} \\ &= \frac{e\beta z m^{\beta-1}}{(1-\alpha)\left(1 + zm^{\beta}\right)} > 0。 \end{aligned} \tag{8c}$$

從式 (8b) 和 (8c) 發現: 提高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可以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 因此可獲得命題 1:

命題 1. 提高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可以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

命題 1 中, 分紅比例的誘因效果和現存文獻結論一致, 例如: 張瀞云 (2011); 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也有激勵員工努力工作的結果是現存文獻較少提到。接著, 將式 (8a) 代入式 (5b), 再求股東追求效用極大的一階條件:

$$\frac{\partial U^s}{\partial s} = (1-\tau)\left(1 + zm^{\beta}\right) A e^{\alpha} \left[\frac{(1-s)\alpha}{(1-\alpha)s} - 1 \right] = 0, \tag{9}$$

$$\frac{\partial U^s}{\partial m} = (1-\tau) \left[\frac{(1-s)}{(1-\alpha)} \frac{\beta(\theta - 1) A e^{\alpha}}{m} - 1 \right] = 0, \tag{10}$$

由式 (9) 獲得最佳的 s^* 爲

$$s^* = \alpha。 \tag{11}$$

式 (11) 的結果可以獲得命題 2 爲:

命題 2. 分紅制度下, 最適分紅比例爲勞動的產出份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上式代入式 (10) 獲得最佳的企業社會責任投入爲

$$m^* = \beta\left(\theta\left(m^*\right) - 1\right) A\left(\frac{\theta\left(m^*\right)\alpha^2 A}{\lambda}\right)^{\frac{\alpha}{1-\alpha}}, \tag{12}$$

式 (12) 爲非線性方程式, 無法獲得封閉解 (closed-form solution), 僅能藉由數值模擬法獲得數值解, 這部分將在第3節呈現。

2.2 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模型

2019年傳出7大銀行理專監守自盜案, 理專監守自盜4.4562億元;[1] 12021年傳出台新銀行理專弊案, 9名客戶遭理專詐騙新台幣3.47億元;[2] 還有2005年安隆公司 (Enron corporation) 騙局案。這些弊案都是投資人無法掌握經理人的行爲, 而導致被騙。資訊經濟學認爲股東和經理人之間有資訊不對稱的狀況, 經理人對於公司財務和經營狀況資訊的掌握, 比股東更具優勢, 因此經理人有機可乘, 會隱匿公司一部分收益占爲己有。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以及 Desai, Dyck, and Zingales (2007) 指出, 經理人經常使用複雜的交易用來避稅, 此舉可向稅捐機關和股東隱藏交易所得, 獲得利益。據此, 本文設定經理人採用複雜交易, 趁機謊報公司收益。在這樣的機會, 經理人面對分紅制度下, 會謊報多少收益? 股東如何決定分紅比例, 才能減少經理人謊報收益, 以降低逃稅的金額? 此外, 經理人短報收益, 造成逃漏稅, 勢必成爲公司的醜聞, 依據相關文獻的主張, Ratto, Thomas, and Ulph (2013)、Di Gioacchino and Fichera (2022), 認爲逃漏稅行爲會產生聲譽損害; 若加入逃漏稅的聲譽損害對公司收益影響效果, 讓經理人分紅減少造成損失, 有可能會抑制短報收益行爲, 在這個考量下, 經理人會短報多少收益?

首先, 經理人要短報公司收益, 必須製造假交易和假會計憑證, 這些都會產生成本, 據此, 本文設計因短報收益而產生的交易成本爲

$$c = c(D), \quad c'(D) > 0, \quad c''(D) > 0, \tag{13a}$$

[1] 新聞出處爲中時新聞網 2019年8月22日報導, 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22004583-260410?chdtv。

[2] 新聞出處爲中央通訊社 2021年7月22日報導, 網址: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7225009.aspx。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中的 D 爲短報收益的金額。爲了方便數學運算和求解, 本文將交易成本函數設定顯函數形式

$$c = \frac{\eta}{2} D^2, \quad \eta > 0, \text{[3]} \tag{13b}$$

式中, η 爲短報收益而造假的交易成本係數。短報收益產生逃漏稅問題有可能損及公司聲譽, 而影響公司收益。Di Gioacchino and Fichera (2022) 認爲影響逃稅的因素, 除了獲得正面的金錢效用外, 另外就是逃漏稅產生負面的聲譽成本。當金錢效用大於聲譽成本, 企業就會選擇逃稅。據此, 股東的目標除了追求最大的稅後利潤外, 還會注重聲譽成本。在參考 Di Gioacchino and Fichera (2022) 的主張, 本文設定加入逃漏稅的聲譽損害函數和經理人短報收益在股東總收益中, 因此股東總收益爲

$$(1-s)\left[\left(1 + zm^{\beta} - D^{\rho}\right) Ae^{\alpha} - D\right], \tag{14}$$

式中, D^{ρ} 爲逃漏稅導致聲譽損害對公司收益影響的損害函數, 其中 ρ 介於0和1之間, 代表逃漏稅產生聲譽損失的份額。基於上述的設定, 股東選擇 s、m 達成效用極大的問題爲

$$\max_{s,m} U^s = (1-\tau)\left[(1-s)\left(\left(1 + zm^{\beta} - D^{\rho}\right) Ae^{\alpha} - D\right) - m\right]。 \tag{15}$$

考慮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占爲己有的行爲, 依據 Crocker and Slemrod (2005) 和張瀞云 (2011) 的設定, 經理人的決策問題就是選擇 e、D 追求效用極大的問題爲

$$\max_{s,D} U^a = s\left[\left(1 + zm^{\beta} - D^{\rho}\right) Ae^{\alpha} - D\right] - \lambda e - \frac{\eta}{2} D^2 + D。 \tag{16}$$

經理人謊報公司收益模型要解出 s^*、e^*、m^* 和 D^*。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時間順序如圖2所示。圖2顯示在經理人進行短報公司收益占爲己有的情況下, 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同樣的, 本文將股東和經理人決策時間視爲一個兩階段的賽局, 股東先決定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源投入, 而後經理人根據股東的決定做出反應, 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努力程度和隱匿公司收益金額。

[3]本文假設交易成本中沒有固定成本, 這是因爲過高的固定成本, 可能使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需付出過高成本而不願意採取行動; 然而, 這可能不是普遍的情況。假如固定成本很低, 使得經理人行動, 則固定成本是不會影響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的決策, 因此本文假定固定成本爲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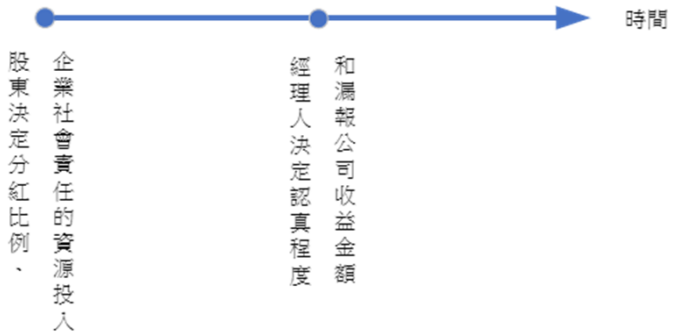


圖 2: 經理人謊報公司收益模型中, 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

本文依然採用由後往前歸納法求解, 先由經理人在已知股東決定 s 和 m 之下, 選擇 e、D, 以達成效用極大化的目標, 滿足式 (16) 問題的一階條件爲

$$\frac{\partial U^a}{\partial e} = s\left[\left(1 + zm^{\beta} - D^{\rho}\right) A\alpha e^{\alpha-1}\right] - \lambda = 0, \tag{17}$$

$$\frac{\partial U^a}{\partial D} = s\left[\left(-\rho D^{\rho-1} A e^{\alpha}\right) - 1\right] - \eta D + 1 = 0。 \tag{18}$$

整理後, 獲得兩條方程式分別爲

$$e = \left(\frac{sA\alpha\left(1 + zm^{\beta} - D^{\rho}\right)}{\lambda}\right)^{\frac{1}{1-\alpha}}, \tag{19}$$

$$D = \frac{1 - s\left(1 + \rho A e^{\alpha} D^{\rho-1}\right)}{\eta}。 \tag{20}$$

以上兩條方程式必須聯立求解, 才能獲得經理人決定努力程度和隱匿公司收益金額的最佳反應方程式; 但因這兩條方程式的結構爲非線性方程式, 無法獲得封閉解。我們將在第 3 節使用數值模擬法處理求解的問題。

式 (19) 和式 (8a) 不一樣的地方是: 式 (19) 的中括號中的分子多出了一項爲 $sA\alpha D^{\rho}$, 其爲減項, 出自於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導致逃漏稅, 產生聲譽減損所引發公司收益的減損。這項效果會抵消 CSR 支出產生聲譽效果, 而逃漏稅產生聲譽減損會損害 s 提升經理人努力程度的誘因效果。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因爲聲譽減損會降低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的邊際報酬。從式 (19) 中, 可獲得命題 3 爲

命題 3. 經理人在可以隱匿公司收益的環境下, 分紅比例提高, 還是能誘發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 但是逃漏稅產生聲譽減損效果會損害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的邊際報酬。

式 (20) 說明: 分紅比例提高, 可以提高紅利, 增加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成本, 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 此外, 分紅比例提高會引發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 而使短報公司收益的成本更爲增加, 導致經理人降低隱匿公司收益金額。另外, 當 $s = 1$ 時, $D = 0$, 其表示將分紅比例訂爲 1, 能杜絕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這正好可以解釋在實證研究裡, 家族企業相對於非家族企業, 較少有避稅紀錄 (Chen et al., 2010; Kourdoumpalou, 2016)。從式 (20) 可獲得命題 4 爲

命題 4. 經理人在可以隱匿公司收益的環境下, 提高分紅比例, 對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金額會有兩種效果, 第一是降低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直接效果; 第二是引發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效果, 此項效果會進一步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金額; 當分紅比例爲 1 時, 能杜絕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行爲。

式 (19)、(20) 聯立求出的 e、D 應爲 s 和 m 的函數, 代入式 (15), 求股東效用極大值一階條件爲

$$\frac{\partial U^s}{\partial s} = (1-\tau)\Big[-\left(\left(1+zm^{\beta}-D^{\rho}\right)Ae^{\alpha}-D\right)+(1-s)\left(\left(-\rho D^{\rho-1}D_s\right)Ae^{\alpha}+D^{\rho}A\alpha e^{\alpha-1}e_s-D_s\right)\Big]=0, \tag{21}$$

$$\frac{\partial U^s}{\partial m} = (1-\tau)\Big\{(1-s)\Big[\left(1+zm^{\beta-1}-\rho D^{\rho-1}D_m\right)Ae^{\alpha}+\left(1+zm^{\beta}-D^{\rho}\right)A\alpha e^{\alpha-1}e_m-D_m\Big]-1\Big)\Big\}=0。 \tag{22}$$

由式 (21) 和式 (22) 聯立求解, 可以獲得使股東效用極大的 s^* 和 m^*, 再代入式 (19)、(20) 獲得 e^* 和 D^*。由於式 (21) 和式 (22) 爲非線性方程式, 無法獲得封閉解, 需藉由數值模擬法獲得數值解, 才能進行分析, 因此本文在第 3 節使用數值分析法完成此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之下, 股東和經理人的預期報酬

	經理人短報未被查獲 機率爲 $(1-p)$	查獲經理人短報 機率爲 p
股東	$(1-\tau)[(1-s)(\theta(m,D)$ $f(e)-D)-m-\varphi f(e)]$	$(1-\tau)[(1-s)(\theta(m)f(e)-D)$ $-m-\varphi f(e)+(1+k)D]$
經理人	$s(\theta(m,D)f(e)-D)-\lambda e$ $-c(D)+D$	$s(\theta(m)f(e)-D)-\lambda e-c(D)$ $-kD$

2.3 租稅治理模型

既然分紅制度無法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下, 完全杜絕經理人隱匿公司部分收益造成重大的損失, 因此必須採用租稅治理制度, 防止因經理人的隱匿行爲產生的稅務風險。稅務風險的來源是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占爲己有, 因此, 必須設立稅務治理部門, 進行監理。在進行稅務監理工作過程, 必須耗費稽查成本。本文仿照 Chen (2003) 假定每單位產出所產生的稽查成本爲 φ, 因此稽查成本 t 爲

$$t=\varphi y。 \tag{23}$$

雖然稽查制度可以發現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行爲, 防止租稅申報不實產生的風險, 但不是所有的謊報公司收益行爲都會被發現。假設經理人謊報行爲抓到的機率爲 p,[4] 一旦被抓獲, 經理人必須將隱匿的公司收益交出, 而且必須接受處罰, 罰金 K 爲

$$K=kD,\quad k>0。 \tag{24}$$

式中的 k 爲每單位短報所得的罰金。依據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被查獲與未查獲做區分, 將這兩種狀況的股東報酬和經理人報酬列於表 1。

需要說明的是: 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未被查獲對股東利益產生的風險有三項: 隱匿收益的金錢損失 $(1-s)D$、聲譽損失造成收益損失 $D^{\rho}f(e)$ 和努力程度改變造成公司收益損失 $(1-s)\theta(m,D)f(e)$; 經理人的利得是

[4]查獲逃稅機率有可能因爲稽查的密度提高而提高, 而稽查密度提高會提高稽查的平均成本, 因此機率和稽查平均成本有正向的關係, 而設定 p 的內生機制; 但本文爲了求解而簡化平均稽查成本爲固定參數, 對應的 p 也成爲固定, 因此 p 依然設爲固定參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 需付出的成本是分紅損失 $s\theta(m,D)f(e)$ 和交易成本 $c(D)$。若查獲短報收益, 股東可以免除聲譽損失風險, 並能追回短報的收益和罰金 $(1+k)D$; 經理人的損失是分紅損失、交易成本和罰金。依據表 1 所列, 股東的預期利得變成

$$(1-\tau)\Big\{(1-p)\left[(1-s)\left[\left(1+zm^{\beta}-D^{\rho}\right)Ae^{\alpha}-D\right]-m-\varphi Ae^{\alpha}\right] + p\left[(1-s)\left[\left(1+zm^{\beta}\right)Ae^{\alpha}-D\right]-m-\varphi Ae^{\alpha}\right]+(1+k)D\Big\}。$$

因此, 股東選擇 s、m 追求效用極大的問題

$$\max_{s,m} U^{s} = (1-\tau)\Big\{\left[(1-s)\left[\left(1+zm^{\beta}\right)Ae^{\alpha}-D\right]-m-\varphi Ae^{\alpha}\right] - (1-p)(1-s)D^{\rho}Ae^{\alpha}+(1+k)D\Big\}, \tag{25}$$

經理人選擇 e、D 追求效用極大的問題

$$\max_{e,D} U^{a} = \left[s\left(\left(1+zm^{\beta}\right)Ae^{\alpha}-D\right)-\lambda e-\frac{\eta}{2}D^{2}\right] + (1-p)\left(D-sD^{\rho}Ae^{\alpha}\right)-pkD。 \tag{26}$$

租稅治理模型要解出 s^{*}、e^{*}、m^{*} 和 D^{*}。他們的決策時間順序顯示在圖 3。圖 3 顯示在經理人進行短報公司收益占爲己有的情況下, 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首先股東決定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 接著由經理人決定努力程度和隱匿公司收益金額, 最後由公司查核, 依據查獲機率決定查獲案件, 進行處罰。

本文同樣採用由後往前歸納法求解, 在經理人已知股東決定 s 和 m 之下, 選擇 e、D, 以達成效用極大化的目標, 滿足式 (26) 問題的一階條件爲

$$\frac{\partial U^{a}}{\partial e} = \left[s\left[\left(1+zm^{\beta}\right)-(1-p)D^{\rho}\right]\left(A\alpha e^{\alpha-1}\right)-\lambda\right]=0, \tag{27}$$

$$\frac{\partial U^{a}}{\partial D} = [-s-\eta D]+(1-p)\left(1-s\rho D^{\rho-1}Ae^{\alpha}\right)-pk=0。 \tag{28}$$

式 (27) 可以解出經理人選擇努力程度的最佳行爲方程式爲

$$e=\left\{\frac{A\alpha s\left[\left(1+zm^{\beta}\right)-(1-p)D^{\rho}\right]}{\lambda}\right\}^{\frac{1}{1-\alpha}}。 \tag{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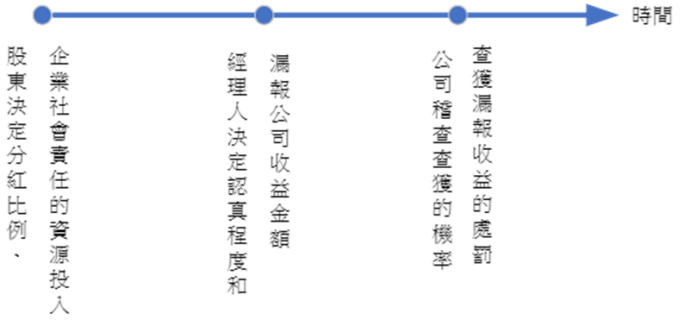


圖 3: 股東和經理人的決策歷程 (有租稅治理制度運作)

式 (29)、式 (19)、式 (8a) 對比, 當 $p = 1$, 式 (29) 就變成式 (8a), 表示若能完全查獲短報公司收益行爲, 就能回到基本模型; 當 $p = 0$ 時, 式 (29) 就變成式 (19), 此時就回到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模型。整理式 (28) 可以解出經理人選擇短報收益的最佳行爲方程式爲

$$D = \frac{(1-p)\left(1 - s\rho D^{\rho-1} A e^{\alpha}\right) - pk - s}{\eta}。 \tag{30}$$

類似的情況, 當 $p = 0$, 式 (30) 就變成式 (20), 表示此時的經理人選擇隱匿收益行爲與在隱匿收益模型中的選擇一樣。令式 (30) 的 $D = 0$ 可獲得完全防止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單位罰金 k, 即

$$k = \frac{1-s}{p} - 1。 \tag{31}$$

該式表示當查獲機率較高時, 或者分紅比例較高者, 單位罰金就可以降低。這正好符合效率工資文獻,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Kruse (1992)、Chang and Lai (1999), 所主張: 老闆阻止員工做傷害公司的事, 例如偷懶, 可以選擇獎勵措施 (紅蘿蔔)、如分紅、提高工資, 或是監督處罰 (棍棒) 如解雇、罰款, 兩者有抵換關係, 文獻上稱爲紅蘿蔔或棍棒 (carrot or stick) 的替代效果。

將式 (29)、(30) 聯立求解, 解出最佳的 e、D。在代入式 (25), 求股東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效用極大值一階條件爲

$$\frac{\partial U^s}{\partial s} = (1-\tau)\Big\{\left[(-1)\left[\left(1+zm^{\beta}\right)Ae^{\alpha}-D\right]\right]+\left[(1-s)\left[\left(1+zm^{\beta}\right)A\alpha e^{\alpha-1}e_s-D_s\right]-\varphi A\alpha e^{\alpha-1}e_s\right]-(1-p)\Big[\left((1-s)\rho D^{\rho-1}D_s-D^{\rho}\right)Ae^{\alpha}+(1-s)D^{\rho}A\alpha e^{\alpha-1}e_s\Big]+(1+k)D_s\Big\}=0, \quad (32)$$

$$\frac{\partial U^s}{\partial m} = (1-\tau)\Big\{\left[(1-s)\left[\left(1+zm^{\beta-1}\right)Ae^{\alpha}+\left(1+zm^{\beta}\right)A\alpha e^{\alpha-1}e_m-D_m\right]-1-\varphi A\alpha e^{\alpha-1}e_m\right]-(1-p)(1-s)\left(\rho D^{\rho-1}D_m Ae^{\alpha}+D^{\rho}A\alpha e^{\alpha-1}e_m\right)+(1+k)D_m\Big\}=0。 \quad (33)$$

由式 (32) 和式 (33) 聯立求解, 可獲得能使股東效用極大的 s^* 和 m^*, 再代入式 (29)、(30) 獲得 e^* 和 D^*。然而, 式 (32) 和式 (33) 爲非線性方程式, 無法獲得封閉解, 僅能藉由數值模擬法獲得數值解, 我們將分析過程和結果在第3節呈現。

3 數值模擬分析

3.1 模型參數值

本節說明模型參數值設定依據, 是參考實證文獻蒐集的數據和經濟理論文獻做參數校正模擬所用的參數值, 若無參考值就由本文自行設定, 說明如下:

(1) 勞動產出份額, $\alpha = 0.35$, 本文參考 Doan and Wan (2017)、劉碧珍, 楊子菡, 與黃登興 (2020) 的實證文獻所設定的數值。Doan and Wan (2017) 收集1986個產業勞動產出份額, 可能每種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和勞動密集程度不同, 勞動份額值的區間頗大, 最小爲0.09, 最大爲0.86; 類似的情況, 劉碧珍, 楊子菡, 與黃登興 (2020) 以台灣製造業爲研究對象, 羅列出25個中分位產業, 各產業的勞動份額差距, 平均介於15.5%–78%之間。基於這兩篇文獻的資料, 本文將勞動產出份額設爲0.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CSR 聲譽產出份額, $\beta = 0.6$。聲譽與 CSR 的實證文獻雖多, 但大多不是直接用 CSR 變數和聲譽變數估計它們之間的投入產出關係。根據 González-Rodríguez et al. (2021) 文章中, 估計獲得 CSR 對聲譽的衝擊係數爲 0.6, 據此, 本文認定 CSR 支出增加一個百分比所產生的聲譽百分比爲 $\beta = 0.6$。從基本模型爲範本, 我們將 CSR 支出設定接近 1, 經過參數校對, 獲得聲譽傳播的技術參數 z 設定爲 2。

(3) 逃稅的交易成本係數, $\eta = 0.15$, 本文取自 Chen (2003) 的設定。

(4) 勞動負效用權重, $\lambda = 0.5$, 這個設定是因爲努力程度 (e) 需落在 0 和 1 間, 才符合常理, 根據式 (8a) 的推估, λ 設定 0.5 可符合此條件。

(5) 技術參數, $A = 1$, 本文取自 Chang and Lai (2021) 的設定, 將技術參數標準化設定爲 1。

(6) 稽查案件單位成本, $\varphi = 0.0082$, 本文取自 Chen (2003) 的設定。

(7) 查獲隱匿公司收益的機率, $p = 0.3$。本文基於黃美祝, 林世銘, 與黃玟心 (2012) 的研究, 該文利用 2000 年及 2002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及查核資料做逃漏稅研究, 該文在選取的樣本中, 大約有 0.25 比例是大額低報稅額、大約有 0.5 比例是無低報稅額, 據此可得有 0.25 比例是小額低報稅額。本文推估, 大額低報稅額較容易查獲, 小額低報稅額就較不容易查獲, 因此設定查獲隱匿公司收益的機率爲 0.3。

(8) 查獲隱匿公司收益的懲罰率, $k = 0.5$。本文取自 Chen (2003) 的設定。

(9) 逃稅產生的聲譽損失參數 ρ, 在理論的設定是介於 0 和 1 之間, 相關研究, 例如: Ratto, Thomas, and Ulph (2013)、Di Gioacchino and Fichera (2022), 未尋獲關於逃稅產生的聲譽損失參數的估計, 因此依據隱匿公司收益模型的結果做校準, 將損害函數 (D^{ρ}) 單位化爲 1, 因此設定 $\rho = 0.01$。

(10) 稅率, $\tau = 0.05$, 此設定是依據台灣目前的營業稅率。

3.2 基本模型數值模擬分析

圖 4 是依據式 (8a) 代入式 (6b), 使經理人效用 (U^s) 成爲分紅比例、CSR 支出的函數。圖中顯示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效用的影響, 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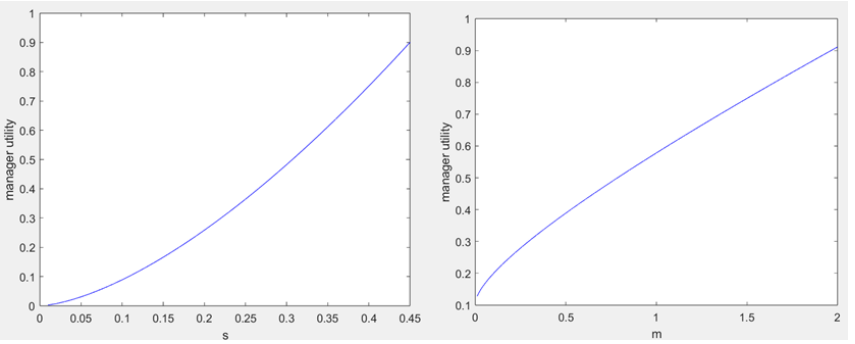


圖 4: 基本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效用的影響

正是呈現經理人對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做出最佳反應所獲得的效用水準。

圖 4 左圖的橫軸爲分紅比例、縱軸爲經理人效用水準, 其顯示在給定 $m = 1.09475$, 分紅比例變動對經理人效用呈正向影響; 右圖的橫軸爲 CSR 支出、縱軸爲經理人效用水準, 其顯示在給定 $s = 0.35$, 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的效用影響也是正向; 呈現如此的關係是因爲分紅比例提高和 CSR 支出增加均會提高經理人的工作報酬所致。

圖 5 是基於式 (8a) 劃出。左圖的橫軸爲分紅比例、縱軸爲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 該圖顯示給定 $m = 1.09475$, 分紅比例變動對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影響是正向; 右圖的橫軸爲 CSR 支出, 縱軸爲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 該圖顯示給定 $s = 0.35$, 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影響是正向; 呈現這樣的關係是因爲分紅比例提高和 CSR 支出增加均會提高經理人投入工作的報酬, 因此經理人願意提供較多的努力投入工作; 這樣結果說明 CSR 支出和分紅制度一樣, 有誘發經理人工作努力效果, 體現出命題 1 的內容。

圖 6 式基於式 (8a) 代入式 (5b) 後劃出。圖 6 左圖的橫軸爲分紅比例、縱軸爲股東效用水準, 該圖顯示在給定 $m = 1.09475$, 分紅比例變動對股東效用水準影響是有正向和反向; 圖中曲線呈山丘狀, 峯頂爲模型的解, 所對應的分紅比例爲 0.35、股東效用水準爲 0.6202; 圖 6 右圖的橫軸爲 CSR 支出, 縱軸爲股東效用水準, 圖中在給定 $s = 0.35$, 其曲線也是呈現山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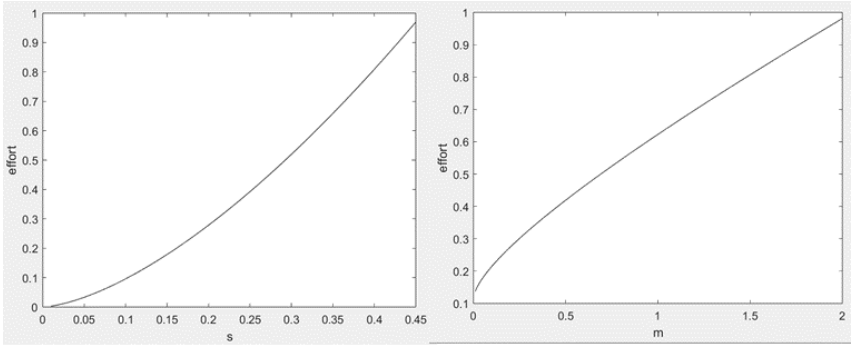


圖 5: 基本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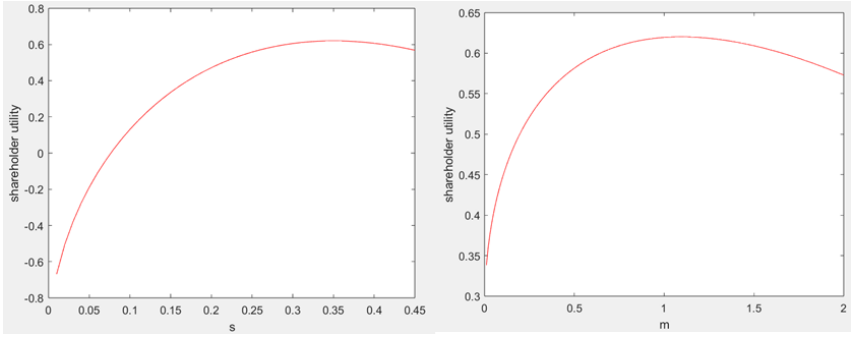


圖 6: 基本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股東效用的影響

狀, 峯頂所對應的 CSR 支出爲 1.09475, 就是使股東效用最大最佳 CSR 支出。其他變數: 經理人的努力程度爲 0.6587; 經理人的效用水準爲 0.6117。

需要說明的是, 分紅比例變動對股東效用 (等同於公司利潤) 會產生兩種效果, 首先, 分紅比例上升會使給付經理人工資增加, 因此成本上升、公司利潤下降, 股東效用減少; 再者, 分紅比例上升, 會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 使產出增加, 公司收益因而提高, 公司利潤上升, 股東效用增加, 這兩種效果交互作用, 在分紅比例較小的階段, 使股東效用上升的效果強於股東效用下降的效果, 因此股東效用隨分紅比例上升而增加; 當分紅比例超過勞動產出份額水準時, 股東效用下降的效果就強於股東效用上升的效果, 股東效用隨分紅比例上升而下降, 因此分紅比例和股東的效用水準呈現山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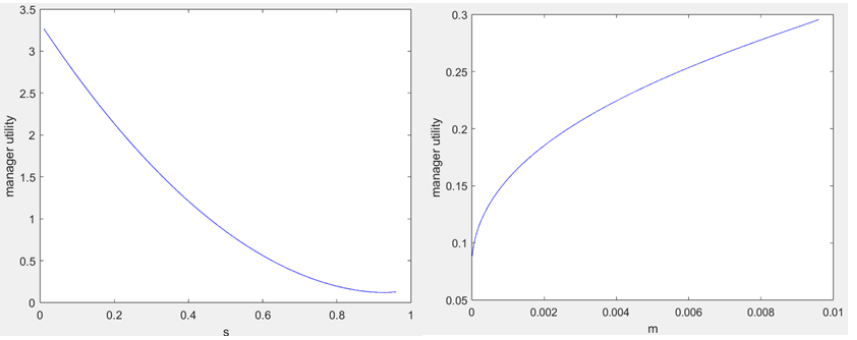


圖 7: 隱匿公司收益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效用的影響

狀曲線。股東最大的分紅比例爲 0.35 正好是勞動產出份額, 正好應證命題 2 的內容。

CSR 支出變動對股東效用也會產生三種效果, 首先是成本增加效果, 其二爲聲譽增加效果, 第三是經理人努力程度增加效果。在 CSR 從 0 開始增加初期, 後兩種效果大於成本增加效果, 而後邊際報酬遞減作用, 使得後兩者效果減弱而小於成本增加效果, 因此使曲線呈現山丘狀曲線。

3.3 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模型數值模擬分析

圖 7 是依據式 (16)、(19)、(20) 畫出。左圖和右圖分別顯示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模型中, 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 它們與經理人效用水準的關係。相較於圖 4, 分紅比例和經理人效用水準之間的關係有很大的不同: 左圖的曲線剛開始呈負斜率狀態, 過了 $s = 0.9$ 的位置才開始翻轉成正斜率。這表示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這部分是得不到紅利, 導致激勵效果變弱, 而使產出下降, 加上隱匿收益造成逃漏稅, 導致聲譽損失、公司收益減損, 更把誘因效果壓制, 獲得紅利更少, 因此經理人效用隨著分紅比例上升下跌, 直到分紅比例變得夠大, 才開始有夠強激勵效果, 使經理人效用翻轉呈正向關係。右圖顯示正斜率曲線, 表示 CSR 支出增加可增加經理人所得, 使得經理人效用水準提高。

圖 8 是依據式 (19)、(20) 劃出。左圖是給定 $m = 0.0004$ 所畫出, 其顯示分紅比例和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關係; 右圖是給定 $s = 0.96$ 所畫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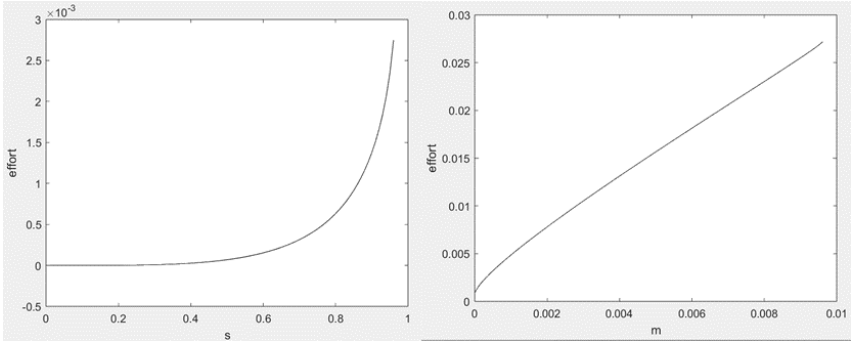


圖 8: 隱匿收益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影響

其顯示 CSR 支出和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關係。兩圖呈現正斜率曲線, 表示分紅比例、CSR 支出都能作爲激勵制度的工具。與和圖 5 相比, 圖 8 左圖和圖 5 不一樣的地方是: 圖 8 縱軸數字縮水變小。左圖顯示隱匿收益行爲把分紅比例對努力程度的誘因變小, 在 s 很小時特別嚴重。這是因爲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無法算進分紅中, 導致分紅比例提高的誘因效果變小。另外, 發生逃漏稅, 導致聲譽損失, 會對公司收益產生不良影響, 也會使誘因效果變小; 左圖顯示 CSR 支出的誘因效果變小的原因是: CSR 支出是透過聲譽效果使經理人努力工作的報酬提高, 但是隱匿收益產生逃漏稅聲譽減損效果會抵消 CSR 支出所創造聲譽效果, 因此 CSR 支出所創造的誘因效果變小。

圖 9 是依據式 (19)、(20) 劃出, 其中左圖給定 $m = 0.0004$、右圖給定 $s = 0.96$。左圖顯示分紅比例提高可抑制隱匿收益金額, 而成反向關係的曲線。這是因爲提高分紅比例可以提高紅利, 增加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成本, 而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行爲; 此外, 分紅比例提高會誘發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 使短報公司收益成本更爲增加, 經理人會降低短報公司收益金額。圖 9 右圖顯示 CSR 支出和隱匿公司收益呈反向關係, 也就是說分紅比例增加可使隱匿收益變小。這是因爲 CSR 支出增加引發經理人努力效果, 而提高隱匿收益的成本。在此發現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可用來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風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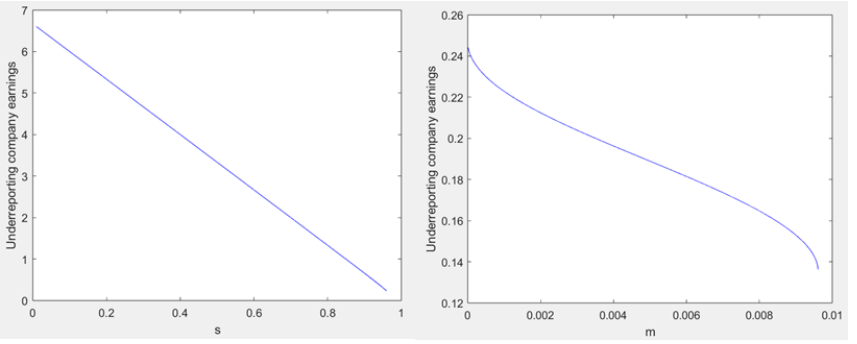


圖 9: 隱匿收益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隱匿收益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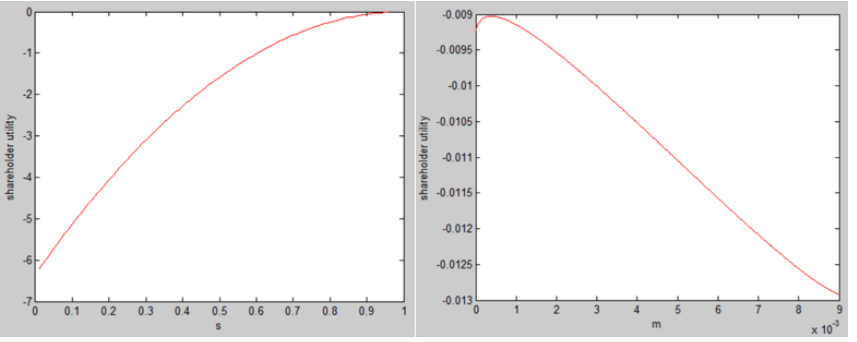


圖 10: 隱匿收益模型,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股東效用的影響

圖 10 是依據式 (15)、(19)、(20) 並將給定 $m = 0.0004$、$s = 0.96$ 劃出。左圖、右圖, 分別顯示分紅比例變動和 CSR 支出對股東效用水準的影響。與圖 6 相比, 左圖只剩下山丘左半邊, 而且效用值變成負, 其表示分紅比例增加, 抑制經理人隱匿收益的行爲, 提升股東效用, 但是整體來說, 隱匿收益的損害還存在, 即使分紅比例提升至很高的水準, 仍然無法使股東的效用轉正; 右圖在左邊有個山丘, 而後就下滑呈現負斜率曲線。這是因爲提高 CSR 支出, 雖然能帶來抑制經理人隱匿收益的效果而增加股東的效用, 但是隨 CSR 支出增加所付出的成本, 會壓過 CSR 的正面效果, 使得股東效用下跌。最後求的數值解: 分紅比例爲 0.96、CSR 支出爲 0.0004、經理努力工作程度爲 0.0028、隱匿收益爲 0.2318、經理人效用爲 0.1292、股東效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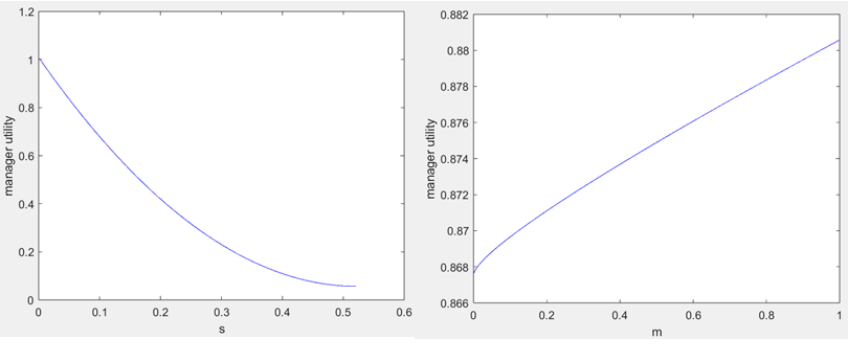


圖 11: 租稅治理模型中,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效用的影響

爲 −0.009。

3.4 租稅治理模型數值模擬分析

圖 11 是依據式 (26)、(29)、(30)、並將左圖設定 $m = 0.0029$、右圖設定 $s = 0.0193$ 劃出。左圖曲線形狀和圖 7 類似, 表示租稅治理模型中, 仍有查不到隱匿公司收益的可能, 因此在隱匿收益模型中所產生的抑制誘因效果也會影響分紅比例和經理人效用的關係, 曲線反轉點提前至 $s = 0.5$, 也就是這裡的紅利誘因效果比隱匿模型強。圖 11 右圖仍然呈現 CSR 支出增加提高經理人工作報酬, 使得經理人效用水準提高。

圖 12 是依據式 (29)、(30)、並將左圖設定 $m = 0.0029$、右圖設定 $s = 0.0193$ 劃出。圖 12 的曲線形狀和圖 8 曲線比較, 有些不一樣, 圖 12 左圖曲線沒有平坦的部分, 右圖曲線較爲陡峭, 這是因爲在租稅治理模型中, 監察和處罰機制能消除部分逃稅產生風險, 提高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的誘因功能, 因此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努力程度的影響變大。

圖 13 依據式 (29)、(30)、並將左圖設定 $m = 0.0029$、右圖設定 $s = 0.0193$ 劃出。左圖顯示分紅比例和經理人隱匿收益呈反向關係; 右圖顯示 CSR 支出和經理人隱匿收益成反向關係。這表示提高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可做爲防止經理人隱匿收益產生的逃稅風險。

根據圖 9、圖 13 所顯示的情況, 我們發現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不僅能誘發經理人增加努力程度, 而且能抑制他們隱匿公司收益行爲, 因此獲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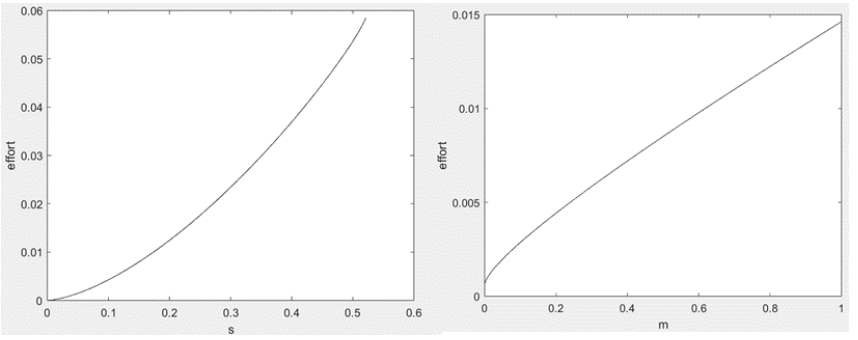


圖 12: 租稅治理模型中,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努力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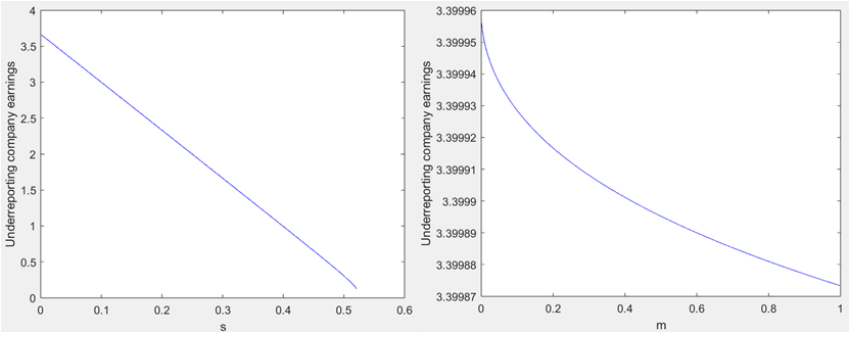


圖 13: 租稅治理模型中,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經理人隱匿收益的影響

以下命題:

命題 5. 提高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可以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 防止其所衍伸的逃漏稅問題。

最後, 依據式 (25)、(29)、(30)、並將左圖設定 $m = 0.0029$、右圖設定 $s = 0.0193$ 劃出圖 14。圖 14 顯示能使股東效用最高的分紅比例和 CSR 支出分別爲 0.0193、0.0029; 經理努力工作程度爲 0.0003、隱匿收益爲 3.538、股東效用爲 2.024、經理人效用爲 0.9391。我們將三組模型解出數值解整理在表 2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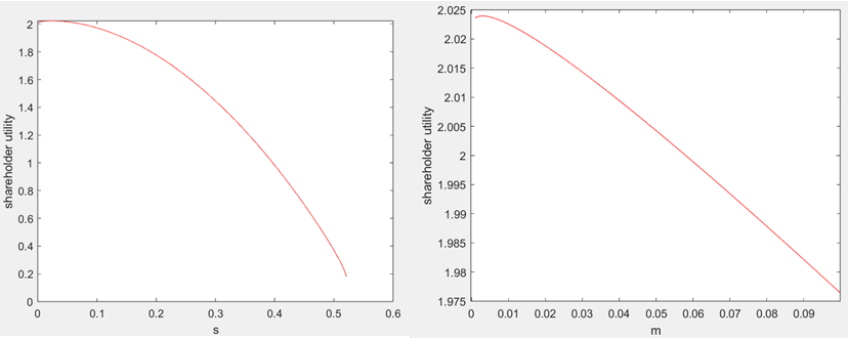


圖 14: 租稅治理模型中, 分紅比例、CSR 支出變動對股東效用的影響

表 2: 三個模型的數值解

	s	m	e	D	U_s	U_a
基本模型	0.35	1.0948	0.6587	–	0.6202	0.6117
隱匿收益模型	0.96	0.0004	0.0028	0.2318	−0.0090	0.1292
租稅治理模型	0.0193	0.0029	0.0003	3.5380	2.0240	0.9391

從表 2 中可以看出: 在基本模型中, 由於沒有隱匿收益的風險, 因此分紅制度和 CSR 支出能充分發揮誘因機制, 引發經理人努力程度和 CSR 支出是三個模型最高。在隱匿收益模型中, 經理人的隱匿收益行爲, 嚴重傷害股東利益, 導致股東效用降低且爲負效用。股東對付這種狀況是選擇較高的分紅比例應對, 這個能從圖 10 中看到股東的效用隨著分紅比例增加而增加。在隱匿收益模型中, 經理人隱匿收益造成逃漏稅, 引發聲譽減損效果影響公司收益, 不利分紅而抑制其發揮誘因效果, 因此在隱匿收益模型中, 大幅提升分紅比例, 努力程度依然低於基本模型。股東爲了對抗經理人隱匿收益行爲的傷害, 提高分紅比例, 透過分紅比例的誘因效果降低經理人隱匿收益金額。據此, 在隱匿收益模型裡, 經理人獲得大部分生產收益, 還掠奪股東的收益, 因此效用水準高於基本模型的效用水準, 而股東的效用水準爲負, 是當中最低的。

在沒有機會發生隱匿收益風險時, 股東可以按照資源的邊際報生產力和邊際成本投入於分紅和 CSR。用於分紅可取得經理人努力的報酬、投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嚴格租稅治理模型的數值解

	s	m	e	D	U_s	U_a
嚴格租稅治理	0.001%	0.001%	0.0007%	0.0666	0.1567	0.0003

CSR 資源可提高聲譽, 獲得報酬。基於追求利潤極大原則, 兩種投入的邊際報酬均等。在基本模型中, 因爲沒有逃稅的聲譽損失風險, CSR 支出最多。在隱匿收益模型中, 股東採用提高分紅比例政策, 提高經理人採取隱匿收益的成本, 就沒有辦法將資源放在 CSR, 因此 CSR 支出是三個制度中最少。當引入租稅治理機制後, 股東選擇較低的分紅比例。但因監督處罰機制較爲寬鬆, 無法遏止短報收益行爲, 而產生較大的聲譽損失, 於是股東提高 CSR 支出, 挽回聲譽損失, 補償逃稅所造成的損失, 因此租稅治理模型的 CSR 支出比在隱匿收益模型中的大。

比較隱匿收益模型和租稅治理模型的分紅比例值, 前者大於後者, 表示租稅治理的監督機制建立, 股東會以監督機制取代誘因機制, 形成替代現象, 因此獲得命題 6 爲

命題 6. 當監督機制建立, 股東會以監督機制代替誘因機制, 符合效率工資假說「紅蘿蔔或棍棒」的權衡選擇。

在此讓人疑惑的是, 引進租稅治理, 爲何隱匿收益的金額變高。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股東並沒有選擇以紅利制度去對付經理人的隱匿收益行爲, 所以沒有像隱匿收益模型那樣用很高的分紅比例讓經理人減少隱匿收益行爲。第二、模型中的租稅治理設定是寬鬆的, 抓獲機率設定爲 0.3, 表示有 7 成的隱匿行爲沒抓到。抓到也是繳回不法所得外加罰金, 罰金參數的設定 0.5, 並不嚴重。第三、對股東來說, 查獲罪犯有額外的罰款可收, 對經理人來說, 有 7 成機率可以獲得不義之財, 雙方有利可圖, 此時兩者效用水準是最高。

假如執行嚴格租稅治理政策, 將罰金提高, 是否會改善隱匿收益的金額呢? 本文將 k 原設定 0.5 提升到 2.3, 獲得的數值列於表 3:

從中發現: 嚴格租稅治理政策獲得隱匿公司收益金額大幅下降, 有達成減少逃稅風險目標; 然而, 股東會選擇更低的分紅比例, 符合命題 6 的主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隱匿收益模型, 交易成本係數變動的效果

	s	m	e	D	U_s	U_a
$\eta = 0.1$	0.97	0.0004	0.0028	0.2516	−0.0074	0.1287
$\eta = 0.15$	0.96	0.0004	0.0028	0.2318	−0.0090	0.1292
$\eta = 0.2$	0.95	0.0004	0.0028	0.2231	−0.0108	0.1289

租稅治理模型中, 若採用重罰政策, 會使經理人的努力程度、CSR 支出、股東和經理人效用滑落。據此, 獲得命題7爲

命題 7. 嚴格租稅治理, 可抑制逃稅行爲, 但是股東會選擇很小分紅比例, 放棄誘因機制; 經理人會選擇較低的工作努力程度, 而股東和經理人的效用會下降。

接下來要探討的是: 經理人要短報收益, 必須製造複雜交易, 獲得會計憑證, 才能規避稽查人員的查核, 在這過程中, 會產生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大小, 是否會影響隱匿收益模型和租稅治理模型的結果? 首先, 我們變動逃稅的交易成本係數 η, 分別設定爲0.1和0.2求解, 再與原設定的0.15的結果比較, 其結果顯示於表4:

從表4中獲得: 較低的交易成本 ($\eta = 0.1$), 對應較高隱匿收益金額, 而較高的交易成本 ($\eta = 0.2$), 對應較低隱匿收益金額, 表示較高的交易成本, 增加經理人隱匿收益的邊際成本, 使其減少隱匿收益金額。另外, 交易成本係數提高, 會提高經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 這有可能是經理人隱匿收益的成本提高, 因此轉變由努力工作賺取收益, 提升效用, 所產生的替代效果; 經理人的效用水準的變化是不確定: 當交易成本係數由0.1提升至0.15, 效用水準是提升; 當交易成本係數由0.15提升至0.2, 效用水準是下降。股東得知經理人面對交易成本係數改變的最佳反應, 就隨交易成本係數增加而降低分紅比例, 盡可能規避損失; 然而, 其效用水準還是隨之降低。

接者, 同樣的作法運用於租稅治理模型, 其結果顯示於表5:

從表5中獲得: 提高交易成本係數, 會使隱匿收益金額下降, 其表示較高的交易成本, 會增加經理人隱匿收益的邊際成本, 使其減少隱匿收益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租稅治理模型, 交易成本係數變動的效果

	s	m	e	D	U_s	U_a
$\eta = 0.1$	0.0114	0.0013	0.0001	5.3860	3.0300	1.4505
$\eta = 0.15$	0.0193	0.0029	0.0003	3.5380	2.0240	0.9391
$\eta = 0.2$	0.0277	0.0052	0.0005	2.6115	1.5219	0.6825

額; 此時, 經理人會增加工作的努力程度, 產生替代效果, 彌補隱匿收益金額減少的損失; 經理人的效用水準在此過程是下跌。股東得知經理人面對交易成本係數改變的最佳反應, 除了隨交易成本係數增加而增加分紅比例外, 也增加 CSR 支出; 然而, 其效用水準還是隨之降低。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紅制度、稽核審查、追討短報公司收益和處罰機制放入當事人 — 代理人模型中, 探討分紅制度、企業社會責任和租稅治理是否能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和減少逃稅, 獲得結論如下:

1. 當股東無法掌握經理人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 經理人努力程度就成爲股東觀察不到的隱藏行爲。此時以分紅制度作爲公司治理的工具, 用來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是有效的, 這與張瀞云 (2011) 的結果一致。另外, 公司投入企業社會資源, 提高公司信譽, 使公司收益增加, 也會激勵經理人努力工作。
2. 若只存在經理人工作努力程度的隱藏行爲, 則股東可以使用分紅制度激勵經理人, 將分紅比例設定在勞動產出份額就能達成股東效用極大目標。
3. 當經理人能夠掌控公司收益, 謊報公司收益占爲己有, 而股東無法掌握時, 此時短報公司收益的行爲就成爲經理人隱藏行爲。短報公司收益所致的逃漏稅會產生聲譽減損, 不利公司營收, 此會降低分紅比例的誘因效果, 也會降低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對營收的增加效果。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 可以降低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的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額; 但要完全杜絕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 須將分紅比例訂爲 1, 才能杜絕經理人短報公司收益。

4. 提高分紅比例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可以抑制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 防止其所衍伸的逃漏稅問題。
5. 租稅治理監督機制建立, 股東會因監督機制而選擇較小的分紅比例; 在租稅治理制度中, 若處罰不夠, 加上分紅比例下降所致的誘因不足, 會加劇經理人隱匿公司收益的金額, 而且經理人會降低工作努力程度。
6. 採用嚴格租稅治理, 會抑制逃稅行爲, 但是股東會選擇放棄誘因機制, 降低企業社會責任支出, 經理人會選擇較低的工作努力程度, 而股東和經理人的效用會下降。
7. 本文討論基本模型、隱匿收益模型和租稅治理模型三個模型, 並使用數值模擬分析求解。若以經理人和股東兩者的效用水準高低作爲制度選擇的基準, 本文發現租稅治理模型所獲得的經理人和股東兩者的效用水準比其他模型高, 據此可以推論: 租稅治理監督機制 (合理的稽核審查、追討短報公司收益和合理的處罰機制)、分紅制度和企業社會責任支出相互搭配, 可以使經理人和股東兩者獲得較高的效用水準。
8. 本文使用數值模擬分析法在隱匿收益模型和租稅治理模型中, 探討交易成本係數提高對模型數值解的影響。結果發現: 提高交易成本係數, 會增加經理人隱匿收益的邊際成本, 而使隱匿收益金額下降; 此時, 經理人會增加工作的努力程度, 產生替代效果, 彌補隱匿收益金額減少的損失; 然而, 股東在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選擇。在隱匿收益模型中, 股東保持 CSR 支出, 減少紅利比例; 在租稅治理模型中, 股東增加 CSR 支出和提高紅利比例; 然而, 在兩個模型中, 股東效用水準會隨交易成本係數提高而降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池祥萱, 繆文娟, 與莊澄臻 (2014), “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公司財務績效之影響是雙面刃嗎? 來自全球500大公司之證據,” 《管理學報》, 31(1), 1–19。(Chih, Hsiang-Hsuan, Wen-Chuan Miao, and Ying-Cheng Chuang (2014),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Double-Edged Sword? Evidence from Fortune Global 500 Compan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search*, 31(1), 1–19.)

吳朝欽與顏志達 (2011), “考慮社會責任下獨佔廠商的生產與逃漏稅決策,” 《農業與經濟》, 46, 85–101。(Wu, Tsaur-Chin and CHih-Ta Yen (2011), “Tax Evasion and Monopoly Output Decisions in the Pres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46, 85–101.)

林嬌能與許彩蓮 (2011), “家族企業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 《會計學報》, 4(1), 23–49。(Lin, Gai-Neng and Tsai-Lien Hsu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irms and Tax Planning,” *Soochow Journal of Accounting*, 4(1), 23–49.)

張瀞云 (2011), “利潤分紅與公司逃漏稅,” 《經濟與管理論叢》, 7(2), 185–198。(Chang, Jing-Jun (2011), “Profit-Based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Tax Evas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7(2), 185–198.)

陳琳方, 翁堃嵐, 與郭虹瑩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公司逃漏稅與利潤稅的中立性,” 《社會科學論叢》, 14(1), 85–98。(Chen, Lin-Fang, K. L. Glen Ueng, and Horn-In Kuo (2020), “CSR, Corporate Tax Evasion and the Neutrality of Profit,”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14(1), 85–98.)

黃美祝, 林世銘, 與黃玟心 (2012), “前期選案查核經驗對後續年度營利事業租稅逃漏之影響,” 《應用經濟論叢》, 92, 59–91。(Huang Mei-Juh, Su-Ming Lin, and Wen-Hsin Huang (2012), “The Effect of Prior Audit Experience on Subsequent Tax Noncompliance,” *Taiwa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92, 59–91.)

劉碧珍, 楊子菡, 與黃登興 (2020), “全球化對勞動份額之影響 — 台灣製造業分析,” 《經濟論文叢刊》, 48(3), 421–451。(Liu Bih-Jane, Tzu-Han Yang, and Deng-Shing Huang (2020),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bor Shares-So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aiwan Economic Review*, 48(3), 421–451.)

Allingham, Michael G. and Agnar Sandmo (1972),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4), 323–338.

Bø, Erlend E., Joel Slemrod, and Thor O. Thoresen (2015), "Taxes on the Internet: Deterrence Effects of Public Disclos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7(1), 36–62.

Cabral, Luis (2012), *Living up to Expectations: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 Cheng-wei and Ching-chong Lai (2021), "Optimal Fiscal Policies and Market Structures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8, 1385–1411.

Chang, Juin-jen and Ching-chong Lai (1999), "Carrots or Sticks? A Social Custom Viewpoint on Worker Effor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5(2), 297–310.

Chapagain, Bal R. (2022),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External and Aggregated CSR Practices on the Firm's Reputation and Profitability," *Rajagiri Management Journal*, 16(2), 118–130.

Chen, Been-Lon (2003), "Tax Evas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6(2), 381–403.

Chen, Kong-Pin and C. Y. Cyrus Chu (2005), "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6(1), 151–164.

Chen, Shuping, Xia Chen, Qiang Cheng, and Terry Shevlin (2010),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5(1), 41–61.

Cherian, Jacob, Muhammad Umar, Phung Anh Thu, Thao Nguyen-Trang, Muhammad Safdar Sial, and Nguyen Vinh Khuong (2019),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Sustainability*, 11(4), 1182.

Crocker, Keith and Joel Slemrod (2005), "Corporate Tax Evasion with Agency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 1593–1610.

Deng, Xin, Jun-koo Kang, and Buen Sin Low (2013),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k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0(1), 87–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sai, Mihir A. and Dhammika Dharmapala (2006),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9(1), 145–179.

Desai, Mihir A., Alexander Dyck, and Luigi Zingales (2007), "Theft and Tax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3), 591–623.

Di Gioacchino, Debora and Domenico Fichera (2022), "Tax Evasion and Social Reputation: The Role of Influencers in a Social Network," *Metroeconomica*, 73(4), 1048–1069.

Doan, Ha Thi Thanh and Guanghua Wan (2017),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bor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ADBI Working Paper, No. 639.

Dwenger, Nadja and Lukas Treber (2018), "Shaming for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ew Policy,"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194.

Edmans, Alex (2011), "Does the Stock Market Fully Value Intangibles?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Equity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1(3), 621–640.

Elliott, W. Brooke, Kevin E. Jackson, Mark E. Peecher, and Brian J. White (2014), "The Unintended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n Investors' 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Value," *Accounting Review*, 89(1), 275–302.

Esen, Emel (2013),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ctivities on Build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in Maria Alejandra Gonzalez-perez and Lian Leonard (e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st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33–150.

Friedman, Milton (2007),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in Walther Ch Zimmerli, Markus Holzinger, and Klaus Richter (eds.), *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173–178.

Godfrey, Paul C., Craig B. Merrill, and Jared M. Hansen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holder Valu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isk Management Hypothe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0(4), 425–445.

González-Rodríguez, M. Rodriguez, M. Carmen Díaz-Fernández, Fangfang Shi, and Fevzi Okumus (2021), "Exploring the Links amo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utation, and Performance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99, 1030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uerrazzi, Marco (2020), "Efficiency-Wage Competition: What Happens as the Number of Players Increases?" *Italian Economic Journal*, 6(1), 13–35.

Guerrazzi, Marco and Mauro Sodini (2018), "Efficiency-Wage Competition and Nonlinear Dynamics,"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58, 62–77.

Kim, Yongtae, Myung Seok Park, and Benson Wier (2012),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Review*, 87(3), 761–796.

Kourdoumpalou, Stavroula (2016), "Do Corporate Governance Best Practices Restrain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Gree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8(1), 1–10.

Kruse, Douglas (1992), "Supervision,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 Employer Size-wage Effect,"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31(2), 229–249.

Li, Yan, Khalid Al-Sulaiti, Wang Dongling, Jaffar Abbas, and Ibrahim Al-Sulaiti (2022), "Tax Avoidance Culture and Employees' Behavior Affect Sustainable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10, 964410.

Liu, Chia-Ying (2012), "Share-based Schemes, Efficiency Wages and Economic Growth," *Taiwan Economic Review*, 40(3), 369–388.

Matsumura, Ella Mae, Rachna Prakash, and Sandra C. Vera-Muñoz (2014), "Firm-Value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Disclosures," *Accounting Review*, 89(2), 695–724.

Mishra, Supriti and Damodar Suar (2010),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of Indian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 571–601.

Montenegro, Tânia Menezes (2021), "Tax Evas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 Country-level Study," *Sustainability*, 13(20), 11166.

Neville, Benjamin A., Simon J. Bell, and Bülent Mengüç (2005), "Corporate Reputation, Stakeholders and th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39(9/10), 1184–1198.

Ratto, Marisa, Richard Thomas, and David Ulph (2013),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Auditing Taxpayers," *Public Finance Review*, 41(3), 317–333.

Saeidi, Sayedeh Parastoo, Saudah Sofian, Parvaneh Saeidi, Sayyedeh Parisa Saeidi, and Seyyed Alireza Saaeidi (2015), "How Does Corporate Soci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e to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putation,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8(2), 341–350.

Shapiro, Carl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3), 433–444.

Slemrod, Joel, Obeid Ur Rehman, and Mazhar Waseem (2019),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Motivations for Tax Compliance: Evidence from Pakist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623.

Solow, Robert M. (1979), "Another Possible Source of Wage Stickines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1), 79–82.

Stanaland, Andrea J. S., May O. Lwin, and Patrick E. Murphy (2011),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2, 47–55.

Stephenson, Arinaitwe K. (2009), "The Pursuit of CSR and Business Ethics Policies: Is It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14(2), 251–262.

Story, Joana, Filipa Castanheira, and Silvia Hartig (2016),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Implications for Talent Manage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12(3), 484–505.

Taghian, Mehdi, Clare D'Souza, and Michael Polonsky (2015), "A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ut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11(2), 221–241.

Wang, Leonard F. S. and John L. Conant (1988), "Corporate Tax Evasion and Output Decisions of the Uncertain Monopolist," *National Tax Journal*, 41(4), 579–581.

Wei, An-Pin, Chi-Lu Peng, Hao-Chen Huang, and Shang-Pao Yeh (2020),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Firm Performance: Does Customer Satisfaction Matter?" *Sustainability*, 12(18), 7545.

Yaniv, Gideon (1995), "A Note on the Taxevading Firm," *National Tax Journal*, 48(1), 113–120.

Yusoff, Wan Fauziah Wan and Muhammad Sani Adamu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alaysi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10(4), 345–351.

投稿日期: 2024年1月31日, 接受日期: 2024年9月5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n Dividend Shar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ax Governance Systems Motivate Managers to Work Harder and Reduce Tax Evasion?

Yu-Fong Sun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Feng Chia University

Shi-Ying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ng Tu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fit-based compensation sharing, auditing, recovery of underreported corporate earnings, and penalty mechanisms into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It explores whether dividend- sharing system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ax governance can motivate managers to work hard and reduce tax evas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profit-based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expenditures can motivate managers to work harder and curb their tendency to underreport company earnings. 2. Tax governance systems can lead shareholders to choose a lower profit-based compensation ratio. If the penalties for tax evasion are low, they cannot effectively curb tax evasion behaviors. However, if the penalties are high, they can suppress tax evasion but at the cost of reduced managerial effort, decreas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enditures, and lower utility for both managers and shareholders.

Keywords: dividend sharing, tax evas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D86, H21, G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